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



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

Infl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田 牛◎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



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

Infl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田 牛◎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田牛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96-4597-0

I. ①清… II. ①田… III. ①通货膨胀—研究—中国—1900~1911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2537 号

组稿编辑: 宋 娜
责任编辑: 宋 娜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雨 千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1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4597-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言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经济失调的反映。清末通胀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通胀成因的考察反映财政权力分配格局和货币思想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在引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同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反应。财政权力分散下的通货膨胀不仅具有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的普遍特征，同时也具备区域性、层级性等自身特点。当中央政府介入之后，整顿经济进一步演化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逐渐成为新政财政、货币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一部政治、经济互动的社会变革史。

本书选取清末通胀作为研究对象，以 1900~1911 年为历史的横截面，将其放置于清末财政权力下移与外移、传统货币与财政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探讨，针对通胀历史因素、思想动机、权力分配、政府能力等方面进行层层剖视。传统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的特有现象，金属货币因为本身具有价值，可以通过“蓄水池”作用，调节货币供应量，因此不会发生通胀。银本位制度下，货币数量根据白银和其他商品生产成本比例以及货币以外全社会对白银的需求而定的观点，和金、银购买力因国际产量的波动事实证明，金属货币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晚清时期的中国，不仅存在这种通病，货币市场同时也存有各种劣质货币如贱金属币、纸币等不足值货币，通货膨胀的因素客观存在。

在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在财政危机的刺激下，清政府将改革货币政策作为弥补亏空的可靠方式之一。在“道光萧条”的影响下，咸丰时期国库空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成为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军费开支浩大无法规避的压力下，清政府采取通货贬值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虽然最终渡过军事、政治危机，却留下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与隐患。在各种隐忧中较为突出的莫过于财权的再次分派，地方政府事实上获得货币发行权，为清末通胀准备制度基础。

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财权外移与下移同时存在，“被束缚的财政”一词成为客观而形象的比喻。然而，清末通胀相关的财政权力流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迁，而是明代以来中国对白银供应、定价话语权的缺失。这种缺失并非枪炮掠夺的结果，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 20 世纪初的特殊时期，

这种权力的丢失成为加剧通胀的另一种客观因素。普法战争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金本位，造成银货币性减弱，引起银价持续性跌落，成为中国银计物价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庚子之后，清政府试图学习西方，对社会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造，其力度、深度较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思想层面始终未能领悟欧美精髓，传统财政、货币思想依旧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因为各种赔款的遽增和新政的庞大支出，清廷再次陷入入不敷出的困难境地。为尽快解决赔款、推行新政，中央政府将负担向地方转移，再一次在体制方面承认各省发行货币的合法性。督抚在获得货币发行权之后，利用既得权势，大力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力图将本地收入最大化，最终导致铜元等币种的通货膨胀，其增速超过银计价格。

经济失调发生之后，中央政府首先采取限制铸造、发行等措施力图平抑物价。随着形势的恶化和政治局势的转变，清政府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在行政手段未能奏效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采取法律手段强制性介入。清廷宏观调控的表面原因是降低物价、维持民生，实质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动机在清政府调适各币种力度中有所体现，本质上是货币政策从属性上的反映。在传统思想的指导下，治理效果乏善可陈。具体措施而言，清廷在控制投放的同时引进西方财政、货币制度，初步建立预算体制、中央银行等近代机构，则是将变孕育于不变之中。

清末中国社会具有本身特殊的形态，通货膨胀在体现共有属性之外，具有自身特点：区域性与层级性。两种特点表面是经济现象，实质则是财政权力外移与下移在货币层面的反馈。伴随货币发行权的下移，各省自行颁布不同货币政策，逐渐造成各区域之间流通货币的不同与通货膨胀程度的差别。层级性表现为不同币种购买力不同。整体分析，银计物价降低幅度小于铜计价格，在银、铜元比价方面有所表现。层次性通胀是财权流失程度不同的具体反映。

清末通货膨胀所反映的思想、制度之间的变迁与社会冲突，不仅存在于新政时期，而且能够揭示近代通胀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通货膨胀史的切入点，也是对财权下移与外移、货币思想变迁、货币政策从属性等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整顿经济中，中央力量的介入成为诱发政治博弈的导火索，国地双方围绕财政收益展开一系列较量的同时，在制度层面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财政、货币制度，对民国经济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此次通胀自身具有“层级性”和“区域性”，两种特点不仅是货币问题，同时也是财权离散水平差异的映射。层级性和区域性在体现自身的同时，不断挑战政府治理的效果与执政能力，表明在中央集权水平较低和主权不完整、传统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枝节方面的变革难以有效提高政府行政能力。

目 录

导 论	1
一、通货膨胀下的社会与经济	1
二、理论方法	7
三、学术史回顾	8
四、概念界定	18
五、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19
第一章 咸丰朝的通货膨胀	23
第一节 财政危机触发下的通货膨胀	23
一、“道光萧条”下的短缺财政	23
二、鸦片战争与经济的持续萧条对窘竭财政的冲击	28
第二节 咸丰时期通货膨胀的发展	37
一、太平天国运动对财政的冲击	38
二、发行与强制推行劣质货币	40
三、物价上涨和民间社会恐慌	58
第三节 规复旧制的治理	74
一、打击私铸, 强制推行劣质货币	74
二、终止大钱、贱金属货币、纸币的流通	81
小 结	87
第二章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清末通货膨胀	93
第一节 咸丰之后货币发行权的分散状况的维持与加剧	93
第二节 新政时期清政府的失衡	96
一、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打破财政均衡	96
二、新政支出形成新的财政压力	108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亏空与铸币的滥发	113

一、中央摊派增加与地方财政负担的加剧	114
二、银元、铜元等新式铸币的财政性发行	118
第四节 纸币失控	136
一、外国纸币无序发行与监管无力	136
二、中国金融机构的滥发	141
第五节 银供应的外来性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	154
一、世界主要国家采用金本位, 产生大量过剩白银	155
二、侨汇对白银流动的扭转作用	156
第六节 通货膨胀的发展与恶化	166
一、光绪年间物价的开始上涨	166
二、宣统年间物价增速的加快与经济形势的恶化	172
小 结	175
第三章 通货膨胀影响下的经济与社会	177
第一节 短期内对经济的促进	177
一、铸币余利对财政平衡的作用	177
二、铜元余利对于新政事业的促进	180
第二节 通货膨胀下货币的贬值	184
一、白银购买力的下降	184
二、铜元购买力的下降及其对银元的贬值	187
三、生活物资价格上涨	192
第三节 通货膨胀对民生的影响与民众心理反应	196
一、通货膨胀下财政收支的变化	197
二、商会对地方政府货币政策的回应——以天津商会为例	200
三、抗议价格上升、铜元折价民变的增加	204
小 结	213
第四章 治理与集权: 清政府治理通胀政策的双重性	215
第一节 打击伪币、削弱非中央机构货币铸造权	215
一、打击私铸、私销	216
二、控制地方政府银元、铜元铸造权	220
三、限制非中央机构钞票与外国货币的发行与使用	234
第二节 建立大清银行, 集中发行权	246
第三节 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权的控制, 减少财政赤字	252

一、改革财政制度、清理财政、加强对地方财政控制	252
二、地方财政机构的改革	254
三、尝试建立预算、减少财政赤字	258
第四节 改革本位制度	263
一、金本位	264
二、金汇兑本位	268
三、银本位	271
小 结	276
第五章 通货膨胀对清末新政的影响及其特征	279
第一节 通货膨胀下政治腐败的恶化与清政府内部博弈的加剧	279
一、铜元余利刺激下腐化的加剧	279
二、跨省贩运铜元的出现	281
第二节 货币政策对财政从属性及其与通货膨胀的互动	286
第三节 区域和层级：清末通胀的时代特征	296
小 结	306
结 语	309
一、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主体地位和财政权力离散是通胀爆发与加剧 的根本原因	309
二、清末通胀的特有属性：层级性与区域性	311
三、具体措施的进步与局限	313
附 录	317
参考文献	327
一、古籍	327
二、史料汇编	327
三、报刊史料	329
四、文集、日记、笔记	330
五、研究著作	331
六、研究论文	334
七、志书	337

导 论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话题。民国时期部分专家即开始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国民政府后期的通货膨胀研究在一定时期内是经济史研究的热门，成果相对较多。而清末通货膨胀则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关注程度较小。当然并不是说学术界对于清末通货膨胀没有研究或忽视它的存在，而是指清末通货膨胀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其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并不那么相称。19世纪以来，包括经济学、历史学、财政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对于清末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和研究。但这些努力相对于民国通货膨胀研究来说仍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总而言之，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是一个有相当发展空间的领域。

一、通货膨胀下的社会与经济

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经济发展失调的客观反映。处于新旧激烈碰撞时期的清末，通货膨胀在具备共性的同时，带有自身的色彩。它既有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的共同特征，也有层次性、区域性的自身特点。通过对清末通货膨胀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通货膨胀失控后对经济、社会的消极作用，也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撞击、国地双方激烈博弈和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流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因此，通货膨胀可以作为研究近代中国财政、货币思想变化趋势、国地财权分配等问题一个具体而微薄的载体。通过清末通货膨胀，既可以发现以往成果中相对忽视的财权支离对物价、民生的影响，又能够发掘思想变迁、社会阶层新陈代谢的多重投影。因此，本书以清末通货膨胀为切入点，探讨和分析财权外移、下移和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财政危机诱发的经济失调。与此同时，本书拟从晚清两次通货膨胀中清政府应对措施的异同为切入点，对财政思想、政策近代化程度的差异予以解析与探索。

（一）何为通货膨胀？通胀如何发生？——经济学界关于通胀定义与成因的解释和争议

通货膨胀本身在经济学界缺乏统一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派基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给出迥异的答案。两大观点内部因学派分歧而有不同结论。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注意到金属铸币成色和含金(银)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英国银币“最初似乎含有一磅重的纯银”。随后“数量的标准(即面额)总是愈变愈大,而价值的标准总是愈变愈小”^①。英镑本身价值减少,逐步降低到原有价值 1/3 的同时,额面价值却不断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亚当·斯密认为根本原因是“适合于政府利益的要求”。当政府掌握造币权之后,由于铸币盈余的存在“使政府减低铸币的成色,或者……提高铸币价值”^②。不仅英国,欧洲各国普遍使用这种方法,造成货币价值不同程度的下降,最极端者“只值从前的 1/15”。

亚当·斯密在指出货币成色降低趋势与原因之后,对财政性发行影响也有所关注。他认为,铸造劣质货币暂时有利于财政。从短期分析,因新币本身含银量低,政府债务负担有所减轻。生活必需品因居民收入的限制,相对价格将“便宜一些”。然而,从长期解析,政府必然“要吃大亏”,因为一切税收以不足值货币交纳,实际收入将持续减少,进而引起产业商业发展受阻,减少税源。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其内部对于通货膨胀定义、原因、分类趋于复杂化。凯恩斯在《战争的经济来源》一书中提出两种相互关联、对立的观点:第一,通货膨胀是需求过剩的结果;第二,通过膨胀是成本自发上涨的结果。^③由此延伸出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成因的两种学派: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

萨缪尔森则将通货膨胀定义为: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上升的时期——面包、汽车、理发的价格上升;工资、租金等也都在上升。^④萨缪尔森进一步分析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通货膨胀时期,各种商品价格并不向同方向、按照统一比例运动。这种现象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即“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总产量发生一定程度的特殊变动”^⑤。他还提出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的实际总收入的影响。他认为,轻微通货膨胀将使“工业之轮开始得到良好的润滑油,产量接近于最高水平,私人投资活跃,就业机会多”。

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货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不同的主张。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对将通胀原因进行细化和意识形态化。他认为通胀

① 坎南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04 页。

② 坎南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05 页。

③ 鲍尔著:《通货膨胀与货币理论》,项婷婷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 页。

④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80 页。

⑤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81 页。

根本在各种社会都发生过,“无论货币理论和通货膨胀都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货币的运用大体相同,对于这些社会通货膨胀都能成为一个难题,而且往往就是一个难题”^①。通胀根本原因是“与印刷机有联系的现象”,即货币的无序发行。货币信用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被破坏将造成物价上涨的加剧。

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成因、定义众说纷纭之时,政治经济学同样给予不同的解读。马克思同样注意到金属货币“名实不符”问题,“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②,同时马克思注意到贱金属币在一定时期流通的合理性和伴随经济发展贵金属驱逐贱金属的客观规律。但是马克思似乎并未指明金属货币会发生通货膨胀,他认为“实际流通的货币量,要不断适应于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货币储藏的“蓄水池”,可以当作流通货币流入和溢出的水路,货币流通的水路不至于泛滥”。^③金属货币因本身具有价值,将在过量投放之时通过自身价格实现储藏职能,避免通胀。

马克思之后,中苏等国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观点。苏联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定义为纸币特有现象,沃尔科夫在揭示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通胀之后,将通胀定性为“纸币超过实际经济需要,充塞货币流通渠道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并从阶级斗争立场出发进一步推论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再分配的手段”^④。鲁缅采夫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纸币一节中含蓄地坚持通货膨胀是纸币特有现象的观点,他强调纸币发行数应根据流通所需黄金量决定。当纸币投放量偏离市场需要金币量之时,则“纸币单位所代表的黄金量就要偏离它上面所注明的票面价值”^⑤,即发生贬值。中国经济学界一度持有类似看法,《毛泽东选集》将通货膨胀定义为“资产阶级国家滥发纸币,使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的需要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一种现象”,并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掠夺劳动人民的手段”^⑥。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高鸿业将其定义为“当一个经济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时,宏观经济学就称这个经济经历着通货膨胀”^⑦。

从上述各学派观点综合分析,通货膨胀成因、定义并无共识。高鸿业将西方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财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

③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1页。

④ 沃尔科夫编:《政治经济学词典》,吕亿环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

⑤ 鲁缅采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⑥ 中共扬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共扬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出版1977年,第9页。

⑦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9页。

经济学关于通胀成因分为三类：第一，货币数量论的解释，强调货币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二，总需求与总供给解释，包括从需求的角度和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三，从经济结构因素变动的角度说明通货膨胀原因。^①此外，金属货币能否有效避免通货膨胀存在较大争议。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特有现象，并将其与阶级斗争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定义则相对模糊，亚当·斯密在关注铸币收入对财政暂时性补充的同时，隐含了对金属货币通货膨胀的忧虑。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在肯定纸币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同时，对金属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又认为不那么可靠。他相信“采掘金属的成本，使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金属货币数量，只能在小范围浮动。正由于金属货币数量上限制，货币不可能一钱不值”。^②由此可见，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定义、与币种关系经济学界并无统一论。

在经济学界争论之时，历史学界则以通货膨胀为题研究历史上的货币购买力下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金属货币同样存在通胀。我国经济史学界虽然未明确提出金属货币通货膨胀问题，然则，以往对晚清物价问题的研究事实认可金属货币同样发生通货膨胀，部分著作甚至以通货膨胀为章节标题。如《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第三章题目“咸丰朝的通货膨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设有“一八五三——一八六八的中国通货膨胀”一章，彭信威虽然未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却在《中国货币史》中专设“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朝政府的通货贬值”和“清末币制的变动”两个专题，并将美洲白银涌入西班牙、英国、法国作为该地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此后张国辉等学者相继以通货膨胀为题研究咸丰时期货币贬值现象。经济史学界的研究表明，金属货币存在通货膨胀。

本书认为金属货币同样存在通货膨胀，与纸币不同，金属货币通货膨胀的原因相对复杂，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投放量过多；第二，金属币材价格下降；第三，不足值金属货币铸造。因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一定价值，各币种之间币材价值互异，铸币原料来源不同造成本国政府控制程度的差异等原因，造成金属货币通货膨胀较之纸币具有更高的科研难度。

（二）时空范围说明

目前，历史学界对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成果并无多见。部分学者对具体币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或对白银购买力问题有所涉及。^③但对于清末货币购买

①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3页。

②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财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③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二本，第三份，1993年；梁辰：《铜元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0年；习永凯：《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影响（1800~1935）》，河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2年；习永凯：《白银购买力波动影响清末财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4日。

力变动的整体状况的把握及其原因、影响的探讨则有所不足。杨端六、张国辉、彭泽益等专家对咸丰时期通货膨胀做细致的研究。杨端六在研究的基础上将资料进一步分析、归纳整理形成资料合集。彭泽益、张国辉探讨了咸丰时期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的原因，将通货膨胀归纳为清政府筹措军费的手段和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三位专家的研究将通货膨胀、物价波动与社会联系起来，可视为研究清代通货膨胀的典范，然其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范式，一味将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维护“反动”统治的举措和剥削人民的手段，对于货币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原因和学理方面的必然性缺乏有效解读。何汉威对铜元问题进行了接近于史实的分析，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铜元。因此，学术界当前对于清末通货膨胀相关问题研究较为欠缺，这是本书选择研究 1900~1911 年通货膨胀问题的基本原因。

具体而言，选择通货膨胀的意义在于，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失调状况的一种反映。在英语中，通货膨胀有多种译文，如 inflation, expansion of the currency 等，西方译文的多样化说明其定义的纷乱。西方经济学自身定义的不明既说明问题本身的复杂，也从侧面反映该题的研究价值。

清末，中国似乎并未出现“通货膨胀”一词，国人对其本质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因此称呼不尽相同的同时多局限于表面现象，计有：腾贵、腾昂、暴涨、陡昂、飞涨、极贵、加昂等，即使接触新学较多的梁启超同样未能提出通胀一词。笔者较早发现通货膨胀是于《申报》1917 年 3 月 13 日报道和 1920 年《中国银行通信录》中《美国通货膨胀与物价之地位》的译文。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通货膨胀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逐渐出现于报章之中。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通胀多为后人根据当时经济现象而给予的定性式建构。当今的通货膨胀定义则是对时下经济形势的判断。尽管古今关于通胀定性的来源不同，然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并不受意识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论货币理论和通货膨胀都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原始和先进的社会里，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在民主和独裁的社会里，货币的运用大体相同，对于这些社会通货膨胀都能成为一个难题，而且往往就是一个难题”^①。

至于选择研究 1900~1911 年的通货膨胀，则是因为清末处于社会过渡的关键性阶段，各种势力、问题都呈现发展态势，较之此前与此后的通胀，更加具有后发国家向近代化过渡的典型性和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从时限上分析，1900~1911 年具有典型的样本价值，并构成相对完整的时间段。在该时间段的起点，中国处于制度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洋务运动经过 30 年的努力在器物层面近代化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制度、文化的近代化成为社会发展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财经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 页。

的必然要求。新政开始以后,体制近代化在全国各地得到不同层次的发展。新政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产生互动。1900~1905年,新政着力点依然与器物层面的变革有关。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破坏和新政开展对于货币的需求,虽然货币铸造缺乏中央统一管理却并未引起严重的通货问题,维新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繁荣和发展。1906年之后,伴随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货币滥发进入一轮新的高潮。最终在1905~1907年,造成铜元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由幕后走向前台。此后清政府在宪政运动的推动和掩饰下,将财政、货币制度改革推向高潮,相继建立近代化的度支部和中央银行,试图将分散的财权再次收归中央的同时实现自身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国地双方围绕财政收益问题展开新的博弈,在国地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各省为维护各自铸币盈余相互倾销铜元,形成省际矛盾,为清末独有特点。而且,这段时期,恰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相对快速发展时期,新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中。当经济波动之时,新社会势力初登舞台的举措和行为成为清末通胀本身具有的另一个特征。从制度方面解析,清末新政中央集权虽然未能完全实现,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势力,以铸币权为例,清廷一度将各省铜元厂归并、裁撤,部分省丧失独立货币发行权,下滑迅速的铜元比价得到控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国家一度出现实质上的解体”。^①中央政府对地方掌控程度再次出现下降,通货膨胀开始进入“价格革命”阶段。因此,本书选择1900~1911年为研究时间段,符合历史本体要求的同时便于在新政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和分析。

然而,过渡时期的另一个特征即传统思维在一定时期处于主导地位,货币、财政领域概莫能外。新政时期,传统财政、货币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属性并未因庚子之后西学东渐速度的加快与内容的变化而发生动摇。在赔款和新政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增税引起民间抗议之后,尝试采取通货膨胀税的方式获得额外收入,弥补赤字。与此同时,财权下移与外移问题并未因新政的开展而得到有效解决。中央政府对地方滥铸铜元、滥发纸币的干涉虽然呈现逐渐升级过程,一度控制其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却无法恢复清前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即使与日本同期相比,清中央政府同样呈现弱势集权特征。在华外国银行势力扩大,发行纸币数量有所增长和涉及国家增多之外,另一个隐含因素即中国政府对白银供应和定价话语权的缺失。当世界主要国家采用金本位之后,银货币性有所减弱,产量却逐渐增长。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银价出现持续性下降。国际银价下跌成为中国国内物价上涨的助动力之一。虽然这种外移并非西方

^① 严鹏:《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1900~195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3年。

武力强迫的结果，对于经济的消极作用毋庸置疑。清末通货膨胀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此次经济失调的解释，探讨财权外移、下移和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这点正是本书的意义性与合理性。

从空间分析，本书以全国为考察范围，但将出现以东、中部地区为中心的态势。首先，这种研究角度的选择由客观历史和资料分布所决定。通货膨胀是货币体系发生故障的征兆，对于经济发达、商品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影响较大，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域影响较小。其次，因中国通胀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将造成本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相较而言，清政府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改革幅度较大，实施更为积极。如咸丰时期，货币制度变革较大的有北京和福建，西部各省除云南、陕西有部分变化之外，其余各省所见资料记载相对较少。新政时期，东、中部各省继续成为改革的先锋。铜元铸造大省为湖北、江苏，最早制造银元的则为广东。大清银行分行大多设于东、中部地区的通商大埠，西部地区分散数量较少。另外，因为东、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新社会阶层产生、发展和势力相对较强，较之西部更加具有新旧过渡的特征。以商会为例，清末时期苏州和天津地区商会逐步开始由单纯保护商人利益的民间组织向抗议地方政府货币政策、维持本地区社会治安、经济和物价稳定转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气势与力度。所以，将研究视野集中于东、中部地区是历史事实所决定的，因为历史研究只能从事件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二、理论方法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尝试借鉴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等相关科目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对清末通货膨胀本身发生、发展的探讨，不仅分析通货膨胀的社会影响、民间反应，而且讨论通胀背后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和权力原因。

1. 历史实证研究

历史学的基础是史料，唯有掌握充足的资料方能取得较有力的成果。本书涉及资料相对复杂，主要分布在档案、文集、报刊、地方志、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因此，只有多方整理、收集资料方能获得较有说服力的依据。

2. 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它要求学者对双方事物都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对比包括纵向的古今比较和横向的中外对照。通过两者参照可以看出不同个体发展程度原因的差异，进一步解析产生不同的原因。本书通过纵向对比

两次通货膨胀中国国家政策、民间反应的不同体现中国近代化中社会的变迁,通过横向对比不同政策制定者立场、出发点的差异解释传统财政、货币思想的主导地位。

3. 国家与社会视角

清末中国处于器物变革到制度转变的变局之中,中央财政权力下移、外移呈尾大不掉之势。下移而言,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虽然屡次试图收回已经被地方政府侵蚀的财政权力,但却因督抚集体抵制而乏善可陈。庚子之后,清中央政府量化摊派政策进一步确定了地方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合法性,将财权分散推向另一个高峰。

外移而言,清末财权外移分为有形侵蚀与无形流失两部分。有形侵蚀体现为外资银行在华势力的扩大。1900年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华银行数量、涉及国家、发行货币量较之庚子之前有较快增长。外国货币在华流通范围的扩大在造成中国货币市场纷乱的同时,引起国内物价上涨,彭信威将纸币过量发行作为通货膨胀原因之一。无形流失则为清廷对白银供应和定价话语权的缺失。白银成为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之后,中国物价波动基本因素之一即国际银价的变化。普法战争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相继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国际银价逐渐下降引发中国物价与汇率的变化。侵蚀与流失虽然原因不同,然而对经济的消极作用却是不言而喻与无差别的。在财政权力,特别是货币政策制定权与发行权分散的情况下,中国物价上涨趋势将难以避免。

清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也是对财政权力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同时也是维护自身财政收入的举措。其措施既有维持物价稳定、减少经济波动的动机,也有学习西方货币制度,促进体制近代化的进步意义。然则,变孕育于不变之中,不变同样隐含于变局之内。咸丰、光绪两朝不同的改革举措的出发点却未发生根本变化,清朝各级政府的基本动机都是维护自身财政收入的增长或者稳定,发行货币、编制预算、统一造币厂、开设中央银行只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体措施。因此,从国家与社会角度研究清末通货膨胀,可以从变与不变的互动中认识某些关键问题。

三、学术史回顾

因历史与政治原因,学术界既有成果按地理分,可以分为中国大陆与大陆以外地区两部分,按时间跨度区分可以分为1949年以前、1949~1978年、1979年之后三个阶段。本书拟对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的通货膨胀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20 世纪上半叶通货膨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通货膨胀几乎与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相伴相随。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同时，往往成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太平天国时期，咸丰皇帝在军需大增之时果断下令鼓铸大钱。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发行质量轻、面值大的铜钱。在铜源匮乏之时又开铸铁钱、铅钱。在太平天国形势直转之下的 1862 年，户部下令停铸大钱。此次，通货膨胀虽有一些副作用，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财政困难，度过了内外交迫的政治、军事危机。凡事总有两面性，通货膨胀也不例外。通货膨胀往往会脱离政府的控制，使经济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成为政权覆灭的加速器。近代中国，因传统财政、货币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相辅相成。无论是咸丰朝的通货膨胀还是新政时期的通货膨胀，国用不足成为重要的诱发因素，清末又因为财政权力的下移、外移而加剧。当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时，通胀的加剧又会使财政危机更加难以解决，增加赋税、发行货币就会成为一种首选，而这些措施又和通胀一起导致民间负担的加重，引起政治危机。通货膨胀的反复出现影响人民生活的同时，向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向政界、学界提出了亟待回答的问题，如通胀与财政赤字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通胀与财政权力分配格局有哪些互通？为解释各种复杂原因，向以后的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以下拟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通胀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概况、特点和主要观点做简要描述，并对这段时期资料的史料价值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①

20 世纪上半叶的通货膨胀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从财政的角度进行调研；二是以货币学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到互异的结论，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从财政学理论出发，通货膨胀属于与财政危机相关联的货币现象。财政困难逼迫政府发行大面值钞票、贱金属货币以获得“余利”，从而在客观上形成通胀。在经济学家眼中通货膨胀利弊共存，关键在于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将通胀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内。社会学家则认为超级通货膨胀将在社会危机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研究尚处于精英阶层，通胀问题研究大多与社会问题、财政问题相关联。

一、1. 财政学角度

清代财政问题研究开始较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代财政问题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此时有关从财政角度进行通货膨胀研究的尚少，大多是对清朝财政史的概括性描述或对某一方面的论述。1897 年，上海广学会出版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然题名“中国度支”，但实际上专述清代财政。

^① 学术史回顾部分参考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